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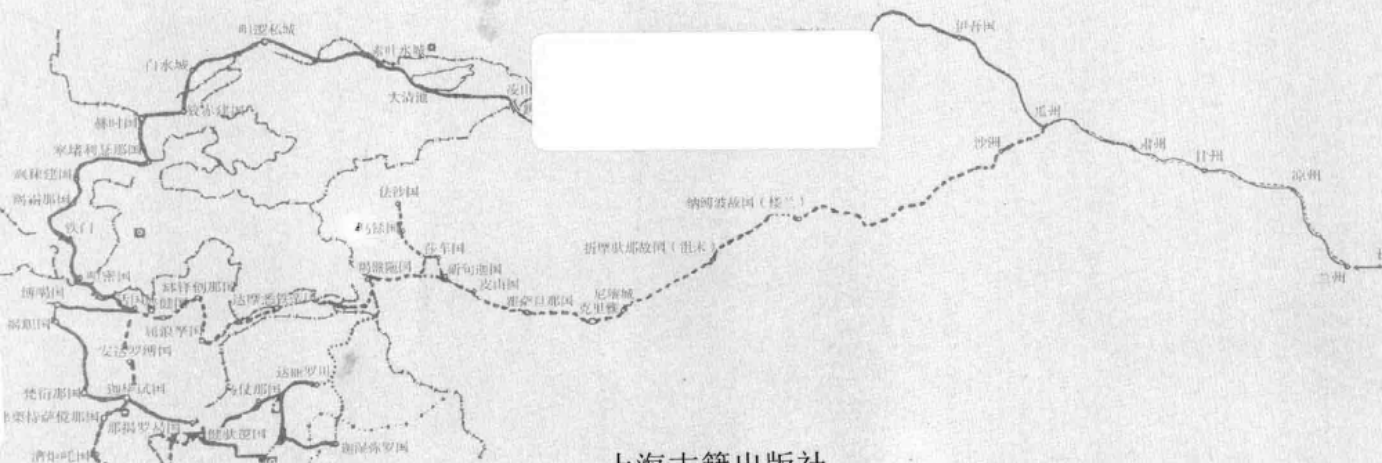
CHONGFENG LI

从印度到中国

BUDDHIST ARCHAEOLOGY

FROM INDIA TO CHINA

I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 李崇峰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325-7095-9

I. ①佛… II. ①李… III. ①佛教考古—印度②佛教
考古—中国 IV. ①K883.51②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5548 号

责任编辑 缪 丹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富 强

ISBN 978-7-5325-7095-9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全二册)

李崇峰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9.25 插页 16 字数 1,06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325-7095-9

K·1815 定价：2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龙门石窟唐代窟龕分期试论

——以大型窟龕为例

一、引言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中游南岸,背依邙山,面临龙门,西扼函谷,东接虎牢;山河拱卫,物产丰富。隋统一后,全国经济迅速恢复。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诏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在洛阳“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1]。唐“武德九年(626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2]。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又诏建东都,因“此都心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岂得宅帝之乡,独称雄于四塞?里王之邑,匪建国于三川?宜改洛阳宫为东都”^[3]。乾封二年(667年)在东都苑东部修建上阳宫。据《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东京记》,“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苑、前苑东垂,南临洛水,西亘穀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列岸修廊连垣……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4]。由于交通方便、四方(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租赋易于集中,东都建立之后,高宗在显庆二年以后

[1]《隋书》卷三《炀帝纪》,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3页。

[2]《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州郡部·叙京都》下引《两京记》,影印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60页。

[3][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十三引《建东都诏》,明隆庆三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参见《全唐文》卷十二《高宗皇帝》,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7页。

[4]《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三《居处部·宫》引《东京记》,影印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48页。

又,[清]缪荃孙编《藕香零拾》所收《元河南志》卷四有相似记载:“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隅,上元(674-676年)中置。南临洛水,西距穀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大帝末年,常居此宫听政。”缪荃孙编《藕香零拾》,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页。

的二十六七年之内,行幸洛阳的时间几占一半,其“所以屡次行幸洛阳,实以经济的原因为主”^[1]。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独揽大权,于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2]，“遂定都于此,日已营构,而宫府备矣”^[3]。据统计,在武则天执政的二十余年里,除大足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临朝长安外,其余都居洛阳。武则天之所以长期留居神都,虽与其政治野心^[4]和个人迷信^[5]有关,但当时两京的不同经济状况,应是很重要的因素^[6]。“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借洛京。”^[7]“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表明了洛阳含嘉仓存储、租粮最多的时期,是在武则天和玄宗时期。据仓内所出窖砖上的刻铭,知窖粮多从江淮运来。唐王朝经济来源逐渐依赖江淮,这是唐前期即已重视洛阳,武则天掌权后,更长期在洛阳听政的主要原因。”^[8]

一个朝代的都城,既是该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该朝君主威势和思想观念的反映。唐初,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而“武后擅权”^[9]，“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10]，“皇曰纳辅,后其谋咨。谋咨攸俟,

[1] 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排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第20页。

[2] 1)《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页;2)《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1页。

[3] 《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州郡部·叙京都》下引《两京记》,影印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60页。

[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34、82-84页。

[5] 据《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高宗废皇后王氏传》,“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废后(王氏)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曰:‘令此二姬骨醉’,数日而卒。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旧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0页。

[6] 参见: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6页;2)全汉昇,上引书,第22页;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9-340页。

[7] 《唐会要》卷二十七《行幸》,影印《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18页。

[8]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见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9]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见《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4页。

[10]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页。

皇用嘉止。亦既顾命,聿怀代已。圣后谦冲,辞不获已。从宜称制,于斯为美。仗义当责,忘躯济厄。神器权临,大运匪革。宗祧永固……英才远略,鸿业大勋。雷霆其武,日月其文。洒以甘露,覆之庆云”^[1]。另据中宗《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则天大圣皇帝内辅外临,将五十载。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2]。据研究,武则天“其人本无坚定之宗教信仰,先以神皇自居。继又自比于转轮王,特攘借释氏之号,妄自尊大而已。早年重儒术,登基时利用佛典为符谶,虽出僧徒辈与薛怀义等之谋,然后之思想早已有‘金轮’二字,形之吟咏。晚岁多病,转而好言长生久视之术……其思想及信仰非释、道之所能囿,晚岁至欲牢笼三教”^[3]。不过,“凡武曩在政治上新取得之地位,悉与佛典之教义为证明”^[4]。因此“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5]。

龙门“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前岸清流,却倚重岫;萦带林薄,密迩京华;似香山之接王城,给园之依卫国也。既资胜地,又属神工,疏凿雕镌,备尽微妙”^[6]。7世纪中叶,随着唐王朝政治和经济中心东移,高宗、武则天佞佛,中国的佛教中心也转移到洛阳,龙门石窟在北朝原有基础上迎来了更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由此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佛教遗迹,堪称中国唐代前期佛教石窟寺之精髓。

[1] 崔融《高宗则天皇后哀册文》,参见姚铨纂《唐文粹》卷三十二《文·后妃·哀册》,载《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8页。

[2]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武承嗣传》附,参见:1)《旧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2页;2)《全唐文》卷十七《中宗皇帝》,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4页。

[3] 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第45卷第3本,第411页。

[4] 陈寅恪《武曩与佛教》,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1页。

[5] 欧阳修于宋嘉佑八年(1063年)重阳后一日,题跋于长安二年(702年)《唐司刑寺大脚迹勒》:“右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二,阁朝隐撰,附诗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虽示之已验之事,犹惧其不信也。此自古圣贤以为难,语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圣人非弃之也,以其语之难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览者知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参见《欧阳修全集》,影印本,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161页。

[6] 龙门贞观二十二年《弥勒像之碑》,参见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龙门石窟现存编号窟龕 2345 座^[1],其中唐代遗迹约占总数的 2/3^[2],大约 1600 余座。据我们现场调查,龙门遗存的唐代大型窟龕 39 座^[3],其余皆为小型窟龕(参见龙门石窟西门、东门立面示意图)。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学界研讨龙门唐代窟

[1] 龙门石窟的编号始于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后来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以及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也都为了调查和记录方便,各自临时做了编号。1954 年,龙门保管所曾组织人力对龙门石窟做了系统调查,统计出 2161 个窟龕。1962 年,北京大学阎文儒先生曾采用分区方法做过编号尝试。1974、1983-1985 年,龙门保管所进一步做了编号研究工作。1988-1991 年,龙门石窟研究所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共同对龙门石窟做了现场调查,依据窟龕地理位置,自西山北端开始至南端,再顺延到东山南端起至北端,顺序编排,共编 2345 个号。当时采用的编号原则是:“凡开凿在崖面上的窟龕,高度超过 30 厘米者均予编号,不足 30 厘米者及洞窟内部小龕不予编号;凡某窟窟门外原设计为此窟形制的组成部分,如建筑形式、力士龕等,其间有后世增开的小龕不予编号。”这次编号为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和旅游提供了一定方便,但也明显存在不足,致使窟、龕界限不清,未考虑彼此间之关系。如,东山看经寺(编为 2194 号)是武周时期开凿的一座大窟,由前庭和主室两部分构成。然而编号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只以高 30 厘米为准,导致该窟前庭左右侧壁开窟后补凿的小龕皆分别编号,从 2185 排到 2204 号。在号码上,前庭小龕与看经寺窟本体并列,无法反映出其相互关系,出现了“窟中窟”现象,既与当时石窟寺的“经营”規制或布局相悖,也不符合编号者预先制定的编号原则。我们认为这种编号原则不适于龙门石窟现存遗迹。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划分出大的区域,然后采用大窟附带小龕的办法加以编排,即分区后,每个大窟编排一个号,然后把大窟周围的诸多小龕作为大窟的附属加以编排。这样,相对来说既能防止“窟中窟”编号现象的出现,也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排号,便于石窟寺的管理、保护和研究。参见:1)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東京:座右實刊行會,1941 年;附表第二《龙门石窟洞名对照表并造窟年代表》;2) 《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4 期,第 121 页;3) 《光明日报》,1962 年 9 月 28 日;4) 龙门石窟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龙门石窟窟龕编号图册》前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年。

[2] 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4 页。

[3] 这里所指的唐代大型窟龕,系指洞窟进深、面阔或高在 3 米以上、保存较为完好的窟龕,且多为国内外学者所熟知。据我们统计,这类窟龕保存较完好者有 33 座,即八作司洞(现编 1628 号)、宝塔洞(现编 1720 号)、宾阳北洞(现编 104 号)、宾阳南洞(现编 159 号)、二莲花北洞(现编 2214 号)、二莲花南洞(现编 2211 号)、奉南洞(现编 1282 号)、大卢舍那像龕(即奉先寺,现编 1280 号)、高平郡王洞(即东山第一窟,现编 2144 号)、惠简洞(现编 565 号)、火上洞(即火顶洞,现编 1524 号)、火下洞(现编 1559 号)、极南洞(现编 1955 号)、敬善寺(现编 403 号)、净土堂(即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现编 1896 号)、看经寺(现编 2194 号)、老龙洞(即老龙窝,现编 669 号)、擂鼓台北洞(现编 2062 号)、擂鼓台南洞(现编 2050 号)、擂鼓台中洞(即大万伍千佛龕,现编 2055 号)、龙华寺(现编 1931 号)、摩崖三佛(现编 435 号)、破窑(即破洞,现编 1069 号)、潜溪寺(即斋戒堂,现编 20 号)、清明寺(现编 557 号)、三佛洞(现编 2150 号)、双窑北洞(现编 521 号)、双窑南洞(现编 522 号)、四雁洞(现编 2220 号)、唐宇洞(现编 1192 号)、万佛洞(现编 543 号)、药方洞(现编 1381 号)、赵客师洞(现编 1038 号)等。此外,还应包括火左洞(火烧洞左侧窟,现编 1517 号)、鸞上洞(鸞驤将军洞上方窟,现编 1729 号)、弥勒像龕上方窟(现编 1071 号)、破上洞(破窑上方窟,现编 1070 号)、普上洞(普泰洞上方窟,现编 1019 号)和赵上洞(赵客师洞上方窟,现编 1045 号)等 6 座。上述 39 座窟龕中,老龙洞和破窑系利用前代大窟雕造数量众多的小龕,主体造像不清,故暂不列入类型分析。火左洞、弥勒上洞、破上洞、普上洞和赵上洞位居高处,现难以登临,只有凭借望远镜观察并根据(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 9 月出版的《龙门石窟总录》补录,其余洞窟皆据笔者实地调查所作记录整理。

龕造像之论著不少^[1],但真正从考古学角度对龙门石窟中唐代窟龕作类型研究的则不多^[2]。

鉴于龙门石窟中小型窟龕数量极为庞大,且许多不易登临,故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基于实地考察所得,拟用考古学方法,首先选择龙门石窟中的大型窟龕试做分期研究;将来一旦时机成熟,再扩展到全部小型龕像^[3]。不当之处,尚待方家指正。

[1] 百年来关于龙门唐代石窟较重要的论著有: 1) 路朝霖撰《洛阳龙门志》,光绪十三年(1887年)刊本; 2) Édouard Chavannes (沙畹),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Leroux,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9-15, 1 vol text, 2 portfolios pls., tome I, 321 ff; 3) Osavld Siren (喜龙仁),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 Benn, 1925, vol. I: c-clii, 123-126; pls. 452-462; 4) 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佛教史蹟》第二輯,東京: 佛教史蹟研究會,1926年: 圖版 51-103; 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佛教史蹟評解》第二集,東京: 佛教史蹟研究會,1926年,第 65-115 页; 5) 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开封: 河南博物馆,1935年; 6)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東京: 座右寶刊行會,1941年; 7) 龙门保管所编《龙门石窟》,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1年; 8)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9) 曾布川寛《龍門石窟における唐代造像の研究》,見《東方學報》,第 60 冊,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8年,第 199-397 页; 顏娟英汉译本见《艺术学》第七期(1992年),第 163-234 页,第八期(1993年),第 99-140 页; 10)《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2年; 11) 阎文儒、常青《龙门石窟研究》,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2) 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3) 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4) 刘景龙、杨超杰编《龙门石窟总录》,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5) Amy McNair (马嘉德), *Donors of Longmen: Faith, Politics and Patronage of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2] 参见: 1) 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见《考古学报》,1979年第 4 期,第 519-545 页; 2)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 172-216 页。

丁先生认为: 龙门唐代前期各种造像的变化均较规整; 唐代后期护法类(天王、力士)及弟子等造像形式的变化,较之佛、菩萨等主像更为明显、自由。不过由于当时条件和其他客观原因,他仅对佛和菩萨像进行了分期和类型研究,同时涉及了窟龕构造和造像布局。在分期排队时,丁先生分小像和大像两部分进行。“小像以龕像为主,辅以小窟的造像”;“大像系指大窟中佛与菩萨两种造像”。其中,佛以结跏趺坐类、菩萨以立式类为例加以排比。

温先生的大作,可谓迄今有关龙门唐代窟龕最为全面的排年。作者认为:“龙门唐窟的排年,因有许多窟龕具有纪年铭,所以是有可靠的年代依据的。我们的排年工作,第一个方法就是依年代序列找出洞窟在结构方面和各种形象演变方面的时代特征,将被研究的洞窟与之相比较分析;第二个方法是就洞窟本身作考古调查,找出其时代的上限或下限。”限于时间和其他因素,该文没有延续作者有关龙门北朝小龕的分期方法,对龙门唐代窟龕未做系统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3] 由于龙门石窟遗存的小型窟龕众多,而考古类型学分析又不允许做主观遴选,因此有些重要窟龕,如唐高宗时期开凿的一批小型窟龕和当时流行的优填王像等,无法纳入我们的分期排队系列,只有留待来日再做全面、系统的勘察和整理。关于这批材料,参见: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上引书,第 172-216 页。

二、龙门石窟唐代窟龕的类型

龙门石窟上述 39 座唐代大型窟龕,通常具前后两部分,即前庭(前室)和主室(后室)。前庭进深一般较短且保存不好,主室则保存相对完整。主室平面多作方形,穹隆顶;一般于正壁及两侧壁造像,窟顶浮雕纹饰或天空。依据洞窟结构及像设,我们分别对上述窟龕的建筑形制、造像题材及组合、造像特征、装饰纹样以及技法等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而后分组排比,找出洞窟的先后发展演变序列,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古学研究。

(一) 窟龕形制

1. 平面

依据洞窟主室的平面布局,可将唐代窟龕分作三型。

A 型: 正壁佛坛窟 / 正壁一龕窟^[1],洞窟平面前半近方形,后半部略作半圆状,正壁及两侧壁后端造像(图 1)。13 个,即宾阳北洞^[2]、宾阳南洞、惠简洞^[3]、敬善寺、摩崖三佛^[4]、破上洞、清明寺、双窟北洞^[5]、双窟南洞^[6]、唐字洞、万佛洞^[7]、药方洞^[8]、赵客师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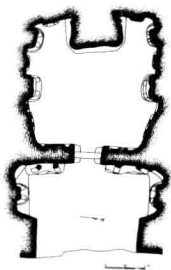


图 1 敬善寺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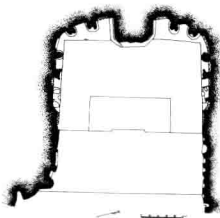


图 2 大卢舍那像龕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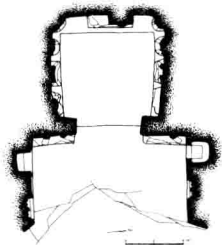


图 3 极南洞平面图

[1] 这种正壁佛坛窟或正壁一龕窟,有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坛或龕,仅在正壁造像一铺。为了行文方便,暂时归入一类。

[2] 宾阳北洞后半部略作半圆形。

[3] 惠简洞后半部略作半圆形,有一高 20 厘米的低坛,上造像。

[4] 摩崖三佛为敞口式大龕。暂入此式。

[5] 双窟北洞后端,凿出高约 20 厘米的低坛,上造像。

[6] 双窟南洞后半略作半圆形,有一高 12 厘米的低坛,上造像。

[7] 万佛洞后半部方整。暂入此式。

[8] 药方洞后半部略作半圆形。

B 型：三壁环坛窟，平面方形，或横长方形，或多边形，正壁略弧，与侧壁相交处多圆角；环左、右、后三壁设高坛，坛上造像（图 2、3、4）。20 个，即八作司洞、宝塔洞、大卢舍那像龕^[1]、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奉南洞、高平郡王洞^[2]、火上洞、火下洞、火左洞、极南洞、净土堂、擂鼓台北洞^[3]、龙华寺^[4]、鷲上洞、弥上洞、普上洞、潜溪寺^[5]、三佛洞、四雁洞^[6]、赵上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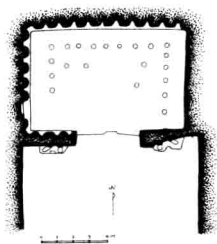


图 4 高平郡王洞平面图

C 型：中心方坛窟，平面方形，正中设坛（图 5）。3 个，即看经寺^[7]、擂鼓台南洞、擂鼓台中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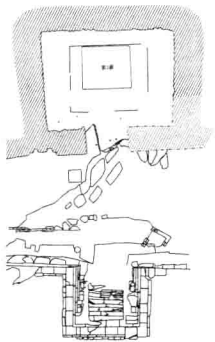


图 5 擂鼓台南洞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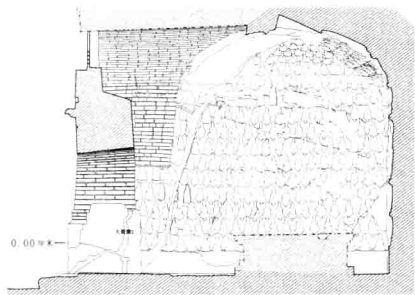


图 6 擂鼓台南洞窟顶示意图

2. 窟顶

依据主室窟顶结构^[8]，可将唐代窟龕分作三型。

A 型：穹隆顶（图 6）。23 个，即宝塔洞^[9]、八作司洞、宾阳北洞、宾阳南洞^[10]、

[1] 大卢舍那像龕为敞口式大龕。暂入此式。

[2] 高平郡王洞平面横长方形，正壁、右壁及前壁右侧造形体较大的坐佛，未按原计划完工。暂入此式。

[3] 擂鼓台北洞平面近五边形，窟内左右后三面设一高约 13 厘米的低坛，上造像。暂入此式。

[4] 龙华寺平面近圆形。

[5] 潜溪寺平面横长方形，四角皆圆作；环三壁设低坛，坛上造像。

[6] 四雁洞平面近圆形，窟内后半部凿一高约 70 厘米的佛坛，上造像。暂入此式。

[7] 看经寺现存窟内方坛，系 2001 年砌造。坛所在地面原有一凹凸不平的地方，呈方形，原应置坛，形如擂鼓台中洞中央残坛内芯及周围地面。此承龙门石窟研究院王振国先生见告。谨此致谢。

[8] 大卢舍那像龕和摩崖三佛系依山开凿的露天大龕，无顶。

[9] 此窟未按计划完工。暂入此式。

[10] 宾阳北洞和宾阳南洞的窟顶纹饰系北魏开窟时原作，后整个洞窟因故中辍。暂入此式。

二莲花北洞、奉南洞、火下洞、火左洞、极南洞、敬善寺、擂鼓台南洞、擂鼓台中洞、龙华寺、鸞上洞、弥上洞、破上洞、普上洞、潜溪寺、清明寺、双窑北洞、双窑南洞^[1]、药方洞、赵客师洞。

B型：平顶，顶与侧壁连接处较圆缓。7个，即惠简洞、净土堂、看经寺^[2]、擂鼓台北洞、唐字洞、万佛洞^[3]、赵上洞^[4]。

C型：浅穹顶与平顶混合式，窟顶边缘与斜坡门道顶部交接处略高出后者或与之几乎持平，有的顶部直接通至窟外。5个，即二莲花南洞、高平郡王洞^[5]、火上洞、三佛洞、四雁洞。

（二）造像题材及组合

1. 造像题材

依据窟内主要造像可以将唐代窟龕分作三型。

A型：一佛，主尊雕造于正壁中央，两侧为胁侍像（图7）。31个，即八作司洞、宝塔洞、宾阳北洞、宾阳南洞、大卢舍那像龕、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奉南洞、高平郡王洞、惠简洞、火上洞、火下洞、火左洞、极南洞、敬善寺、净土堂、擂鼓台南洞^[6]、擂鼓台中洞^[7]、鸞上洞、弥上洞、破上洞、普上洞^[8]、潜溪寺、清明寺、双窑南洞、四雁洞^[9]、唐字洞、万佛洞、药方洞、赵客师洞、赵上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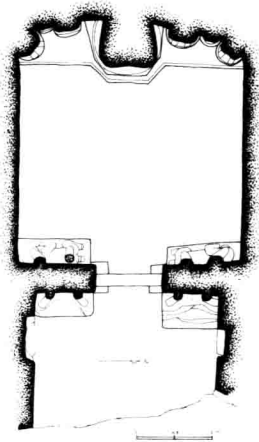


图7 万佛洞造像题材示意图

B型：三佛，左、右、后三壁各造一佛，个别窟在正壁与侧壁间再造二佛（图8）。5个，即擂鼓台北洞、龙华寺^[10]、摩崖三佛、三佛洞、

[1] 双窑南洞窟顶前半为筒拱（纵券），后半作穹隆形，表面无饰。暂入此式。

[2] 看经寺窟顶与侧壁连接作直角。暂入此式。

[3] 万佛洞窟顶与侧壁连接作直角。暂入此式。

[4] 赵上洞窟顶近横券。暂入此式。

[5] 此窟未按计划完工，窟顶表面处理粗糙。暂入此式。

[6] 擂鼓台南洞中央佛坛上主尊，传说从附近寺院移入，因此该像是否为窟内原作，尚不能肯定。不过，依据日人关野贞等1906-1908年间（一说1918年）拍摄的擂鼓台南洞内景照片，该像已置坛上。暂入此式。

[7] 擂鼓台中洞佛坛上原应有造像，但内容现无从知晓。该窟正壁造像为一佛二菩萨，暂入此式。

[8] 普上洞正壁主尊为二佛并坐，表现的可能是释迦多宝这一特点题材。暂入此式。

[9] 四雁洞造像不存，据其坛上现存像座槽孔判断，应为一佛。暂入此式。

[10] 龙华寺造像为五佛，即一坐佛、二弟子、二立佛、二菩萨、二坐佛、二神王、金刚力士、二狮子。暂入此式。

双窟北洞。

C型：多佛。窟壁上雕造数量众多或成千上万尊小型坐佛（图9）。5个，即高平郡王洞、擂鼓台南洞^[1]、擂鼓台中洞、双窟南洞、万佛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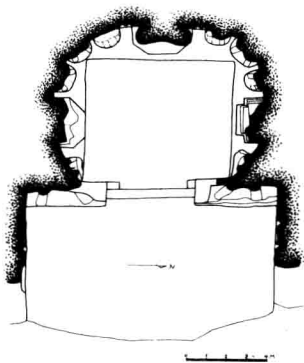


图8 龙华寺造像题材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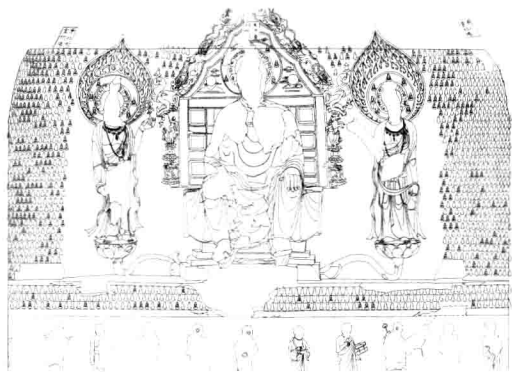


图9 擂鼓台中洞造像题材示意图

2. 造像组合

依据主体造像组合形式，可将唐代窟龕分作二型。

A型：一铺像，即正壁中央造主尊，两侧雕胁侍像。依据组合不同，下分三式。

Ai式：一铺三身或五身像，即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有的在菩萨像外侧各加雕一狮子^[2]（图10）。4个，即宾阳南洞、清明寺^[3]、唐字洞^[4]、赵客师洞。

Aii式：一铺七身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5]或金刚力士^[6]（图

〔1〕 擂鼓台南洞四壁及窟顶雕造的小坐像，目前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菩萨像，一种认为是佛像。另外，该洞正壁未设置主像。暂入此式。参见李崇峰《地婆诃罗、香山寺与“石像七龕”》（见本书）。

〔2〕 依据龙门石窟造像题铭，当时甚至把狮子也列入造像题材之中，如赵客师洞一则题记：“显庆五年（660年）□月□日刘□□于赵客师龕内敬造阿弥陀佛像一躯并二菩萨、二圣僧、狮子、香炉……”。参见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3〕 清明寺造像为一佛二菩萨，另外加雕二狮子。

〔4〕 唐字洞造像为一佛二菩萨。

〔5〕 这种身着铠甲的武士像，通常称作天王。结合现存造像并依照相关题铭，这种“天王”形象，当时皆称作“神王”，如唐咸亨四年（673年）完工的惠简洞题铭和上元二年（675年）完工的大卢舍那像龕（今称奉先寺）题铭。参见：刘景龙、李玉昆主编，上引书，第179、381页。

关于这种护法形象，参见李聿骥《试述李治武曌时期龙门石窟中的神王像：以典型窟龕为例》，载《石窟寺研究》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78-190页。

〔6〕 据宾阳南洞前壁刘玄意题记和大卢舍那像龕题铭，这种威风凛凛的护法形象当时称作“金刚力士”或“金刚”。参见：刘景龙、李玉昆主编，上引书，第51、381页。关于金刚力士，参见李崇峰《金刚力士钩稽》（见本书）。

11)。9个,即宾阳北洞、高平郡王洞、擂鼓台中洞^[1]、弥上洞、破上洞、潜溪寺、双窑南洞、药方洞、赵上洞^[2]。

Aiii 式:一铺九身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和金刚力士(参见图2);有的在神王与金刚力士间各加雕一狮子,构成所谓的一铺十一身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狮子和金刚力士(图12)。16个,即八作司洞^[3]、宝塔洞^[4]、大卢舍那像龕、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奉南洞^[5]、惠简洞^[6]、火上洞、火下洞^[7]、极南洞^[8]、敬善寺^[9]、净土堂^[10]、鸞上洞、普上洞^[11]、四雁洞^[12]、万佛洞^[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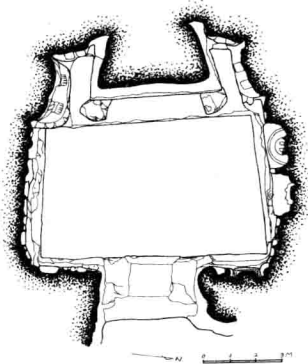


图10 宾阳南洞造像组合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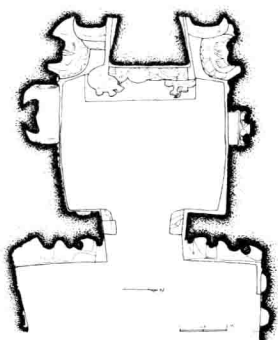


图11 药方洞造像组合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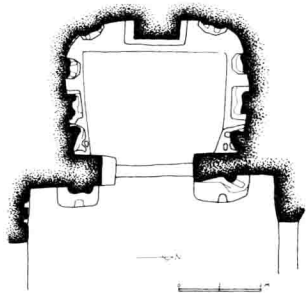


图12 八作司洞造像组合示意图

[1] 擂鼓台中洞正壁主尊为一佛二菩萨,但前庭正壁门道两侧雕金刚力士(右侧雕像已毁)。暂入此式。

[2] 赵上洞窟内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地藏,组合特别。暂入此式。

[3] 八作司洞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狮子和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4] 宝塔洞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狮子和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5] 奉南洞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狮子和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6] 惠简洞左右侧壁外端的两身造像不存,据开窟题记,应为神王和金刚力士像。

[7] 火下洞主室正壁主尊尚存,两侧胁侍已失。从侧壁残存的头光判断,主室应为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前庭为金刚力士及二狮子,即一铺十一身像。暂入此式。

[8] 极南洞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狮子和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9] 敬善寺前庭两侧壁的二菩萨像,似不在原设计之内,应为后来补作而成。其补作时间可能在该窟完工前后,因该窟前庭地面的原设计与双窑前庭相似。暂入此式。

[10] 净土堂内造像不存,依据门楣上题额和正壁造像铭记,主室内原主像应为阿弥陀和观世音、大勢至西方三圣像,加胁侍共十一身。暂入此式。

[11] 普上洞造像为二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和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12] 四雁洞主室内造像不存,仅在坛上存原像座槽孔;前庭正壁两侧雕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13] 万佛洞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狮子和金刚力士。暂入此式。

B型:三铺像,即以三佛为中心的造像(图13)。

5个,即擂鼓台北洞^[1]、龙华寺^[2]、摩崖三佛、三佛洞、双窟北洞^[3]。

(三) 造像特征

1. 佛像

佛像既是寺院(包括石窟寺)像设的核心,又是信徒的主体朝拜对象。佛像特征主要表现在法衣、手印以及姿态等方面。鉴于佛之手印大多残毁,佛像的考古类型学分析仅以洞窟内主尊为例,分法衣与坐姿、头光和像座三部分排比。

(1) 法衣与坐姿

依佛本制,缠缚于佛及僧众身上的法衣或法服,通常有三种,即三衣,制法固定,疑“佛自亲制”^[4]。传说释迦牟尼曾用法服、钵和锡杖教示信徒如何造塔^[5];而现存视觉艺术中表示佛陀“换衣”的唯一画面是犍陀罗出土的一幅浮雕,现为比利时 Claude de Marteau 收藏。该浮雕表现悉达多出家“剃除须发,向猎师边,以僇奢耶衣贸易袈裟清净法服”^[6]场景,为太子下系内衣、披覆上衣之瞬间(图14)^[7]。其中,僇奢耶衣(kāśikā-vastra/kāśikāni-vastrāṇi/kaśeya)系以 Kāśi 生产的细棉或“用野蚕丝棉作衣者”^[8],汉译天衣、宝衣、好衣,音写僇奢耶衣、僇尸迦衣、迦尸迦衣、迦尸衣等。“此衣价直百千亿金,复为种种旃檀香等之所熏修”^[9];袈裟(kāṣā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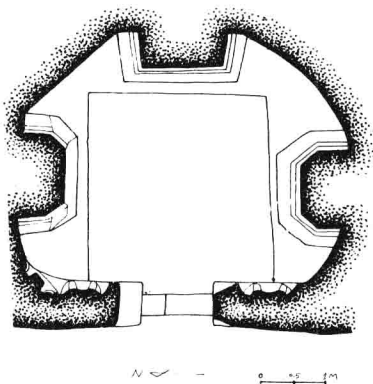


图13 擂鼓台北洞造像组合示意图

[1] 擂鼓台北洞左、右、后三壁各一坐佛,前壁门道两侧各一菩萨像。暂入此式。

[2] 龙华寺造像为一铺十五身,即一坐佛二弟子二立佛二菩萨二坐佛二神王金刚力士及二狮子。暂入此式。

[3] 三佛洞和双窟北洞造像皆一铺十三身,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坐佛二菩萨二神王和金刚力士。

[4]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着衣法式”,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2页。

[5]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缚喝国》,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124页。

[6] 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七《频婆娑罗王劝受俗利品》,参见《大正藏》第3卷,第578c页。

关于僇奢耶衣与袈裟两衣及交换情景,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八《剃发染衣品》和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六《出家品》叙述颇详。参见《大正藏》第3卷,第737c-738a、576c页。

[7] 栗田功《カンダラ美術》,I佛伝,東京:二玄社,1988年,图164。

[8] 玄应《一切经音义》,见《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徐时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

唐初高僧玄应,博学字书,曾参与玄奘译场,担当“正字”之职。因此,玄应对佛教法衣之解释,应代表了唐初此土的权威认识。故本文对法衣之阐释,首选玄应字书。

[9] 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八《剃发染衣品》,《大正藏》第3卷,第738a页。



图 14 天竺三衣及僧祇支披覆图

a. 比利时所藏犍陀罗浮雕“换衣”图；b. 下衣折束示意图；c. 上衣披覆示意图；d. 右袒式上衣示意图；e. 通肩式上衣披覆示意图；f. 通肩式上衣披覆示意图（背面）；g. 通肩式上衣示意图；h. 右袒式上衣披覆示意图（正面）；i. 右袒式上衣披覆示意图（背面）；j. 大衣披覆示意图（正面）；k. 大衣（披肩）正面示意图；l. 大衣（披肩）背面示意图；m. 僧祇支披覆示意图

kaṣāya)^[1] 汉译染色衣、染衣、间色衣、法服,音写袈裟衣、袈裟等,“乃是往古诸佛之服”^[2],为“粗弊衣服袈裟色……是解脱圣人衣”^[3]。至于中土大多数雕塑和绘画中表示的佛陀法衣,疑为艺术家或工匠“对世俗僧人所着袈裟的摹写,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彼时世俗社会中僧人所着袈裟的一些情况”^[4]。对此,格里斯沃尔德(A. B. Griswold)在20世纪60年代以瑞士里特伯格博物馆(Rietberg Museum)藏品为基础,参照上座部传统和南亚及东南亚僧人日常穿着,根据巴利语律典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并与秣菟罗与犍陀罗出土的造像进行对比,对中国雕塑中的佛像法衣做了系统梳理(图14b-f)^[5],颇具启发。据义净记载,佛教“三衣皆名支伐罗(cīvara,三衣巴利语作ti-cīvara,梵语为traya-cīvara或tri-cīvara),北方诸国多名法衣为袈裟,乃是赤色之义,非律文典语”^[6]。因此,袈裟乃北传佛教对三衣之通称^[7]。实际上,佛所披着的三衣^[8],包括复衣(saṅghāṭi

[1] 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四分律音义》:“袈裟,举佉反,下所加反。《韵集》音加沙。字本从毛作髦笔二形。葛洪后作《字苑》始改从衣。案:外国通称袈裟,此云不正色也。诸草木中,若皮、若叶、若花等,不成五味、难以为食者,则名迦沙。此物染衣,其色浊赤,故梵本五浊之浊,亦名迦沙。天竺比丘多用此色,或言缁衣者,当是初译之时见其色浊,因以名也。又案:《如幻三昧经》云:晋言无垢秽。又义云离尘服,或云消瘦衣,或称莲华服,或言间色衣,皆随义立名耳。真谛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言外国虽有五部不同,并皆赤色,言青黑木兰者,但点之异耳”。玄应,上引书,第294页。

[2] 《方广大庄严经》卷六《出家品》,《大正藏》第3卷,第576c页。

[3] 《佛本行集经》卷十八《剃发染衣品》,《大正藏》第3卷,第738a页。

[4] 马世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汉式佛教图像札记之一》,见《艺术史研究》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5] A. B. Griswold,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the Buddha’s Dress in Chinese Sculpture”, in: *Artibus Asiae*, vol. XXVI (1963), No. 2: 85-131, vol. XXVII (1964/65), No. 4: 335-348.

[6]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衣食所须”,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5-76页。

[7] 慧琳《一切经音义》,《大正藏》第54卷,第317c、381c页。

[8] 玄应在《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四分律音义》中,特别对佛法衣作了如下解释:“三衣:僧伽梨,此音讹也,应云僧伽致,或云僧伽底,译云合成,或云重,谓割之合成又重作也。此一衣必割截成,余二衣或割不割,若法密部、说诸有部等多则不割,若圣辩部、大众部等则割。若不割者,直安怙角及以钩纽而已也。

耨多罗僧,或云郁多啰僧伽,或云优多罗僧,或作沕多罗僧,亦犹梵言讹转耳,此译云上着衣也。着谓与身相合,言于常所服中最在其上,故以名焉。或云覆左肩衣。

安多会,或作安多卫,或作安多婆婆,或作安陀罗跋萨,此译云中宿衣,谓近身住也。或云里衣也。”

玄应,上引书,第298页。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衣食所须”条所记三衣,则为:“一、僧伽底,译为复衣也;二、缁咄啰僧伽,译为上衣也;三、安坦婆婆,译为内衣也。”义净,上引书,第75页。

本文关于佛及弟子所着法衣之描述,主要依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相关记述,因为“义净法师所述之袈裟穿着法,是其在印度亲见的标准披着方式”。同时,参照玄奘《大唐西域记》、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及法云《翻译名义集》。值得注意的是,慧琳关于法服的解释似乎主要采纳了义净之说。鉴于迄今讨论佛教法衣的文章多偏重形象比较,本文拟将唐宋关于佛教服饰之重要音义详列出来并附梵文原语(采用拉丁字母转写形式),以纠正同好。参见:1) 义净,上引书,第75-76页;2) 玄奘,上引书,第122-124、176-180页;3)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大正藏》第54卷,第700b页;4) 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大正藏》第54卷,第1171a-b页;5) 荻原雲來《漢訳対照梵和大辭典》,東京:鈴木學術財団,1974年,第1386、244、74页;6) 马世长,上引书,第250页。

僧伽胝,即大衣)^[1]、上衣(uttarāsaṅga 郁多罗僧,即上着衣)^[2]和内衣(antarvāsaka 安多会,即里衣、下衣)^[3],属义净记载的天竺内法“衣食所须”之“充身六物”及“十三资具”中前三种^[4]。不过,现存图像中,除三衣外,佛多内着僧祇支(掩腋衣)^[5],因为“恐汗污三衣,先以此衣掩腋,然后披着三衣”^[6]。依据三衣等“披覆”方式^[7],可将唐代窟龕分作五型。

[1]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大菩萨藏经音义》：“僧伽胝[陟尸反]，旧言僧伽梨，此云合，谓割之合成也。又云重，谓重作也。王宫聚落着之，伏外道衣”；同书卷二十二《瑜伽师地论音义》：“僧伽胝[陟尸反]，此云合，或言重，谓割之合成又重作也。旧经律中作僧伽梨，或作僧伽致，皆讹也。”玄应，上引书，第432、453页。

另，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二《大宝积经音义》，“僧伽胝[音知]，旧曰僧伽梨，此云复衣，即今僧之大衣是也。下从九条，上至二十五条，但取奇数，九种差别具如律文所说。佛制：入王宫时，入聚落时，摧伏外道时，见猛兽时应着此衣”。《大正藏》第54卷，第380c页。

[2]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音义》：“嗢多罗僧[乌没反]，旧云髻多罗，亦云郁多罗，此云上首(着)衣，此谓常着衣中最在上也。”玄应，上引书，第507页。

另，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五《大宝积经音义》，郁多罗僧伽，梵语僧衣名也。即七条袈裟，是三衣之中常服衣也。亦名上衣，见《南海寄归传》；同书卷六十六《集异门足论音义》：“嗢怛罗僧[上温没反]，梵语。唐云上衣，今之七条也。”《大正藏》第54卷，第397a、700b、744c页。

又，另一类似的梵文词是uttariya，意为上衣、外衣、披覆、覆布等，汉译作衣、衣裳。参见：荻原雲来，上引书，第245页。

[3]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四阿含暮抄音义》：“婆喋[丈甲反]，梵言安陀罗婆波，此云五条。”玄应，上引书，第422页。

据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三《二衣总别篇》，“五条者名下衣，从用院内道行杂作衣”。《大正藏》第40卷，第105a页。另，据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安陀会，或安怛罗婆沙，此云中宿衣，谓近身往也。南山云：五条，名下衣，从用云院内行道、杂作衣”。《大正藏》第54卷，第1171b页。

[4] 义净，上引书，第75-76页。

[5] 参见本文菩萨服饰。

[6]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二《根本毗奈耶杂事律音义》，《大正藏》第54卷，第721b页。

[7] 龙门石窟中佛的三衣原皆着色，层次清晰。不过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石雕佛像的原始颜色退去，三衣的披覆方式不宜辨认。因此，我们在类型分析时参考了敦煌莫高窟彩塑和壁画中与之同时期或稍早(隋代)的佛三衣披覆方式。关于中国雕塑和绘画中表现的佛像法衣，参见：1) 马世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汉式佛教图像札记之一》，上引书，第247-268页；2)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1、43、57、92、97、138、163、165、178等；3)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14、18、27、93、99、104、126、143、179等。